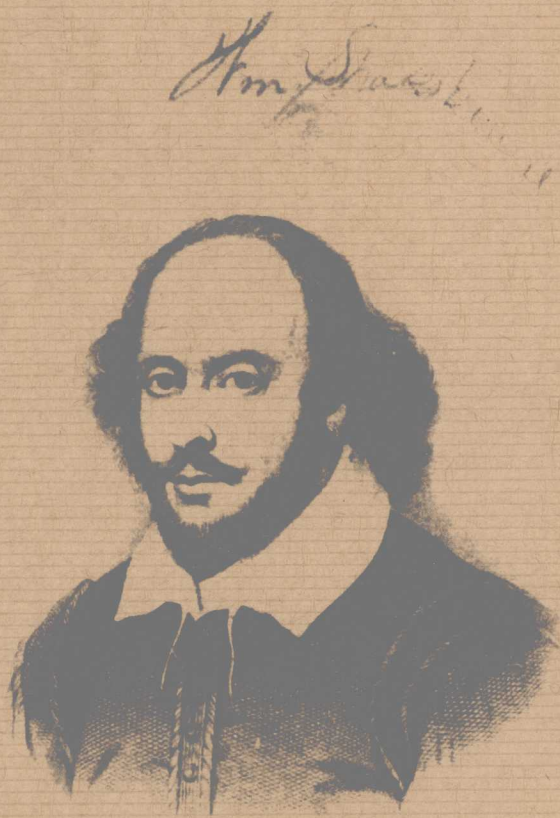


民国学术丛刊·文学史·文学理论编

主编 叶隼 副主编 刘训练



金东雷 著

英国文学史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东雷 著

英国文学史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策 划：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刘训练
责任编辑：顾学云 史 宁
封面设计：未 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史纲 / 金东雷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2
(民国学术丛刊)
ISBN 978-7-5463-1649-9

I. ①英… II. ①金… III. ①文学史—研究—英国
IV. ①I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022 号

书 名：英国文学史纲
著 者：金东雷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35.75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1649-9
定 价：5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民国学术丛刊·文学史·文学理论编

主编 叶隽 副主编 刘训练

民国学术丛刊 总序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除了早期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类代表性的民国著作之外,还有诸如“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中

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团结出版社)、“六点学术·民国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国时代为主要内容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旧籍新刊丛书”(岳麓书社)、“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类出版社的“书库”系列也多以民国名著为主,如“商务印书馆文库”、“三联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而清点 20 世纪或中国现代学术也多半以民国主打,如“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国学”为题的,亦然,如“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还有所谓“近人学术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等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推出一套“民国学术丛刊”的意义究竟何在?

总体来说,随着 20 世纪初之废科举、兴学堂的“霹雳手段”,到了 1910 年代民国肇创后的办教育、立学术,基本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未掀起绝大波澜。所谓“民国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创立、发展时代的学术状况。虽然这段时间前后不到 40 年(1912—1949 年),但其所产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却不容小觑。就此而言,重刊旧籍,其意决非仅是“旧物利用”;它更指向“重温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知“昨日”、资鉴“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学术祖辈”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在历史行进过程中不断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明的悠久典籍与先贤智慧,也理应关注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确立典范的“中国现代学统”。而在学术史意识之初的“回归学统”之外,也要有能力在宏观审视世界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中从容反省,

我们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崩裂、现代初萌、一切仿佛开天辟地的时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留下了怎样的缺憾和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那代人既要为中国现代学术初期之成就定尺度,也要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学术谱系中争位置,可谓“重任在肩”。就此而言,出版这套“民国学术丛刊”也还有编选者、导读者、出版者自身的学术寄托。

相比较时贤的“文字飞扬”,这些尘封在故纸堆中的民国旧书自也有其“晦涩艰深”的一面。这不仅是说文字的易代不同、学科的自然演进、关怀的时代语境等等,也还有“今人”与“前辈”的价值取向、文章风格乃至世道人心之间难以避免的缝隙和差距,故此,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大家的导读,以高深学问而作浅近文字,借助生花妙笔的华彩章句,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或则可把至今仍在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三段六代人。就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段:1912—1952年;1952—1992年;1992—2030年前后。本丛书涉猎范围,基本上是第一阶段和前三代人。第一阶段可谓“黄金时代”,虽政治变动频繁、战争此起彼伏,但学人仍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第二阶段基本属于荒废和接续时代,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史自觉意识的确立才真正接续了原有的现代学术传统;就第三个阶段来说,中国现代学术才刚刚开始不久,仍在进程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是否能拿出“过硬”的成绩来,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是条件基本具备。当此时代,学术史意识已成常识;全球化趋势已大势所趋;电子信息化的应用也都相当普及。中国现代学人可以基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西方学者,挑战和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国

家之发展需要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创生。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未来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期。而最关键的,则是中国的大脑,作为学人的学术与思想,因为他们将成为中国前进的灯塔。故此,学人之承担国运之责任也不可谓不重。当然,这里重点关注的仍是民国,将其定义为狭窄的概念之内,即传统上的 1912—1949 年间。虽然就长时段眼光观之,这短短的 37 年间实在不过“白驹过隙”,可其中孕育的学术生机可能,却确实是“浩浩然大哉”。

就代际变迁来看,可分六代人。原生代(即介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过渡一代人),以沈曾植、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 1870 年前后出生,在传统学术方面造诣深厚,部分学人又借助留东(日本)之便,而得以窥见西学门径,乃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与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代人;第一代,1890 年前后生人,以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具有良好的国学修养,并得时代之机遇而能留学西方(主要是欧美,但如陈垣、钱穆等未留学),不以求学位为终极目标,在五四前后留学归来,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颇多人集中在北大、清华这两大重镇;第二代,1910 年前后生人,以钱锺书、费孝通、冯至、季羨林等为代表,他们仍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除极少数外已难与前代人比肩,多半在抗战前后留学归来,获有博士学位,倾向专门之学,以外国做研究对象者不少,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 1980 年代后的学术薪火传承有重要意义;第三代,1930 年前后生

人,以李泽厚、庞朴、叶秀山、谢冕、刘再复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材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第四代人,1950年前后生人,以葛兆光、陈来、陈平原、桑兵、汪晖等为代表,他们多半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或研究生,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接触到西方的学界状况,部分人也攻读了学位,并借助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东风,形成了自觉的学术史意识,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较之前代学人明显有突破,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绩,是目前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五代人,1970年前后生人,这代人基本尚在形成之中,他们是第四代学人的弟子辈,同时又与第三代学人产生某种“亲密接触”。当然,这样一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它的特征概括也只是相对而言,其目的是为理解民国学术提供一种参照系和整体学术地图坐标。

民国一代学术,主要是第一、二代学人的学术空间。当五四一代以一种“元气淋漓”的激烈方式而确立起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的主导性占位后,后五四一代当然深受影响,纷纷漂洋过海,学习师辈的成功经验,立志“为中国文化寻路”;在1930年代后期,他们的弟子辈多半放洋归来,成为抗战建国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下,可谓成就了“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时代,中国现代学术不但开创了极为辉煌的“事功年代”,且不说自然科学家如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曾昭伦等人的成就,就列举一下人文学者的著作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锺书的《谈艺录》、潘光旦的《优生

与抗战》……正所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文）。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或许还不能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苦苦支撑的纯正学人以实在的“物质支援”，但朱自清先生拒绝美国救济的选择，却仍有那样一种无言的力量。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

相比较原生代人的元气淋漓、第三代人的先天不足、第五代人的行进之中，那么，目前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是第一、二、四代人的学术成绩。尤其是作为承上启下、接续学统的第四代人，他们可谓是“后来居上”，已经贡献出了相当不凡的学术成绩，而且在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诸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汪晖《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4卷、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桑兵《国学与汉学》等皆堪代表，相信不但可以“藏之名山”，亦确可“传之后世”。但恐怕不得不承认的也是，在第四代学人中确实尚未出现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横贯而通的大家人物。

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其功用也不可谓不大。希望我们这些来此探胜者，不要采玉宝山，空手而还。重温第一、二代学者的学术史贡献，不但可以使我们借鉴学

习前人呕心沥血的资源宝藏,而且更可以重温激情岁月的开创时代的学人精神。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无论是在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确立典范”,还是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凡起例”,我们看看著作的题名和作者的立意,就知道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前贤曾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曾确立了一个如何辉煌的起点?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又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作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敬请读者关注。

陈寅恪先生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这是以世界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正在创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其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其言辞则不可谓不中肯。吾辈或可加一句,“有之,自寅恪先生始”。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第一人,寅恪先生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立起关乎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价值观,为后世学人之立精神;更以治学态度的“通识观”确立起学人微观层

面可以依循的伦理观。而中国现代学术的未来发展若能建立在这样一种“通识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则中国现代学术之于世界学术的位置,或可有所希望哉!是为序。

叶隼

2009年4月16日—6月15日

作于北京—欧行旅次之柏林,改定于7月26日北京

一室乾坤大，千秋月旦尊

——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序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英国文学在各国文学中恐怕是最受欢迎的。在大学英文系，师生们基本上直接亲近原著，然而大部分爱好者只是零星地阅读译作，他们对英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脉络所知甚少，要充分理解并欣赏作品就有点困难。当时的图书市场需要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国文学史。这本书就是写给一般爱好英国文学的人或初学英语的学生读的。作者金东雷在《自序》中说，国内还没有一本“笼统地叙述”英国文学的作品，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勉力编成了这本《英国文学史纲》”。或者是出于自谦，他对本书定位不高，称它“只是一种简单的说明”。

本书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2月出版，称得上当时规模最大的用中文写作的英国文学史。作者不是大学教员，更不是名教授，我们在民国学术史上也很难见到他的名字。看起来奇怪，其实不然。当时中国并不是没有在英国文学上造

诣深湛的学者,问题是这样的学者往往对文学史的写作存有疑虑,他们不敢轻易论述自己没有读过的作品或不甚熟悉的时代。金东雷做过记者、编辑,没有专业上的拖累,顾忌较少,落笔又快,反而敢于承担这项在专家看来令人生畏的工作。

据《苏州市志》第29卷记载,金东雷于1905年出生在苏州横塘,后迁至带城桥阔家头巷。他曾就读于苏州博文中学,毕业后任苏州吴中公学小学部主任,继而兼任中学部教师,还在画家颜文樾创办的苏州美术专门学校教过中外文学。他与当地的文人学士交往颇多,著有《东庐诗草》。金东雷家原是很殷实的,后因父亲吸食鸦片,家道中落。或许有感于此,这位中学教师早年在苏州“拒毒会”中活动积极。1931年,观前街旁北局(苏州人称小广场)立起一块林则徐纪念碑(后移到人民商场之南),此事据说还有他的功劳。

上世纪30年代初,金东雷任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编辑,兼任《国闻周刊》编辑。1934年10月,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71岁的赛金花,不久写出《赛金花访问记》。《英国文学史纲》面世后没几个月,日本侵略中国,各地文教新闻事业受到极大干扰。在这民族存亡之秋,金东雷的命运如何,暂时无从查考。不过我们可以在南社诗人、书法家萧蜕庵(又名萧蜕,1876—1958)的《赠金东雷》一诗中得知大概:

东雷天下士,韬迹老衡门。

一室乾坤大,千秋月旦尊。

酒怀茁春艳,诗思结霜根。

寂寞邻家叟,轻狂安可论。

此诗创作时间不详。诗人用了“衡门”的典故，暗指当时金东雷已经有点游离于社会之外，甚至是“安贫乐道”了。不过他的志趣并不受居所的限制，深得士林敬重：“一室乾坤大，千秋月旦尊。”萧蜕庵逝世时金东雷才 53 岁，如果此诗作于三四十年代，那就说明金东雷在步入中年后就遭遇了某种挫折。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他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即使写了这么一部不俗的著作，恐怕也难在讲究学历的大学英语系谋到职位。金东雷于 1991 年逝世。从本书出版的 1937 年至他辞世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又有过怎样的经历？

我们再来谈谈这部著作。据作者自叙，《英国文学史纲》的编写始于 1932 年春，1934 年冬告竣，历时近三年。书成后北大校长蒋梦麟题签，中央大学教授张士一、暨南大学教授傅彦长和吴康应邀作序。可见作者的辛劳还是得到了学界某种程度的认可。

在 1937 年之前的民国图书市场，已经有一些与本书所涉及的领域相关的出版物。为准备此书的编撰，金东雷广搜中英文资料，或参考，或引证，得益极多。这一点可以从各章的页下注里看出大概。这些书籍中有：世界书局和泰东图书馆的两本中文《英国文学史》（分别为小说家曾朴之子曾虚白和王靖所著）；林惠元从英文翻译的《英国文学史》（作者 Delmer）和孙席珍所译的小泉八云的《英国文学》。辞书中则有孙俚工编辑的《文艺辞典》（上海民智书局）。另外有不少从日本来的著作，如鲁迅译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沈端先（即夏衍）译的本间久雄《近代欧洲文艺思潮论》和汪馥泉译的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篇》。参考书目中还有些已译成中文的史籍，如屈维林的《英国史》（钱端升译）和 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梁思成译）。当然，作者

经常查阅的还有一些英文的文学史,例如勒古伊和卡扎米昂(E-mile Legouis and Louis Cazamian)合著的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650—1932* (《英国文学史:650 年至 1932 年》,1934 年版本)。我们从这些著作大致可以推知作者的知识框架。

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研究、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和学报。^① 作者如能挖掘利用这方面的资源,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比如说,在现代部分他参考了刘大杰的《现代英国文艺思潮概观》(载《现代学生》创刊号)和钱歌川的《大战以来的世界文学》(载《新中华杂志》创刊号)等文。当时检索系统毕竟不甚完备,未见提及的高水准文章似也不少,如梅光迪的《安诺德之文化论》(载 1923 年《学衡》)和陈受颐的《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载南开大学 1935 年《社会经济学报》)。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涉及英国拜伦等诗人处很多,作者未用,也许当时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还没有显现。另外,作者还需要跟踪翻译出版的现状,假如不知道某作品已有中译,文学史上翻出来的书名与译本不一致,容易造成混乱。例如笛福的小说 *Moll Flanders* 已在 1931 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梁遇春译本《荡妇自传》,可是在本书中书名却是音译,成了《毛勒佛莱特》。

本书绪言部分将英国文学分为四个时期:草创期、意大利文化影响期、法兰西文化影响期和近代新时期。这四个时期又分十个时代,分别以盎格鲁—撒克逊、盎格鲁—诺曼、乔叟、莎士比亚、清教徒、古典主义、约翰逊、浪漫主义、维多利亚和现代命名。全书就是这么依次写来,不过在乔叟和莎士比亚之间,作者还增

① 详见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年)。

加了“民间文学”和“文艺复兴”两章。最后三章(浪漫主义、维多利亚和现代)篇幅最长,占全书的一半以上。现代部分的“爱尔兰文学复兴”写得比较饱满,不过部分内容似应归功于郑振铎先生《世界史纲》中的有关章节。本书每章都以某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开始,然后介绍主要作家的生平和作品,对作家的思想和风格也有或长或短的评点。这种体例也是一般文学史的常例。至于上述分期是否合理,这篇短序不予讨论。四大时期的提法似属多余,它们的特点没有在全书十二章中得到呼应。“法兰西文化影响期”指的是王政复辟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比较费解。再如“浪漫主义时代”现在已成通行的说法,但是1911年多卷本的《剑桥英国文学史》没有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列入“浪漫主义诗人”的行列,而《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首版1941年)的作者乔治·桑普森甚至不认为存在一个称做“浪漫主义”的运动。

中国人写的英国文学史,总会带有特别的印记。这种印记可能也是读者期待的。本书论及拜伦的部分将《哀希腊诗》全部录下,用的是胡适在《去国集》中的译文。如果作者点明该诗出处(长诗《唐璜》第三章中的《歌吟》),或许更好。金东雷把约翰逊博士致 Lord Chesterfield 的信比为《韩昌黎上宰相书》;他在评盖莱尔(卡莱尔)为克林威尔(克伦威尔)辩护时说:“好像我国近人梁启超为王安石辩护一般,这便是盖莱尔难以自圆其说的短处。”这些都是让我们的目光稍稍留驻的有趣文字。萧伯纳1933年访华,造成媒体轰动。他在这本文学史中所占篇幅十分可观(仅次于莎士比亚),是现代部分最重要的作家。金东雷身为记者、编辑,一定追踪过这位拒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在华的一举一动。他在书中特意赞许了萧伯纳“破风乘浪、周游环球的壮志”。